

穿越都市表象的探索

——台湾新世代小说的文化认同书写

刘伟云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都市题材小说在台湾大量涌现。作为主要书写者的新世代作家,他们在都市表象后隐藏着文化认同撕裂的悖谬,呈现出文化身份确认困境与集体焦虑的后殖民探索。新世代作家在历史探寻中以跨界交融表达了文化认同的诉求与可能。

【关键词】新世代 都市小说 后殖民 文化认同

【作者简介】刘伟云(1983—),女,广东惠州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3-06-12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4)01-0047-05

一、当代台湾的文化认同问题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又可译作文化身份,随着全球化而备受学者关注。在台湾文学中,文化认同问题由来已久。甲午战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日本殖民政权通过改造台北市区的空间结构,使之具有精神性和物质性的双重空间象征意义,形塑了台湾人对皇民身份的认同,导致台湾人“双乡心理”^①下文化认同的扭曲:既无法割舍山川地理的传统想象,也无力拒绝配合日本统治的官方新的山川论述。光复后,吕赫若、吴浊流等作家反日主题的书写是台湾人对殖民时期文化身份的重新反省,而反共怀乡小说的文化乡愁更加深了文化认同的危机。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中对民族、本土文化以及主体性意识的推动,导致的却是此起彼伏的统独论战。正是“二二八事件”的政治伤痕以及与祖国大陆四十年的政治隔离造成了对台湾文化认同的扭曲。延续这一走向,更有将原来反美、反日的文化认同诠释成反华的文化认同,将“二二八”事件的“阶级矛盾”置换成“民族矛盾”这些荒谬的文化逻辑。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而来的都市化发展,西方都市文化的意象已渗透进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中。然而,西方文化带来的

是表征上共同的共享意义,而不是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文化多元与混杂的现象使得台湾文化身份的模糊性凸显,导致文化认同的扭曲与迷失更是愈演愈烈。“‘文化认同感’在迷失甚至走入魔之后,文学的批判功能也无法保持。在这样的状况下,台湾文学如何再有能力提供它独特的文学经验?”^②这是一个学者面对台湾文学在文化认同方面的迷失所发出的深深忧虑,也是当代台湾文学本身在全球性的消费文化降临时,对于文化认同表现出的困惑与焦虑。

二、分裂的感知:都市表象后的认同悖谬

在台湾,从“孤儿意识”到“遗民情结”,从“文化乡愁”到“我本是什么人”的思考,不同世代台湾作家表现出不同的认同思考。林耀德、黄凡等代表

① 施淑《日据时代台湾小说中颓废意识的起源》,见施淑:《两岸文学论集》,第102-120页,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黎湘萍《文学台湾》,第1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的台湾新世代^①作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奠定文坛地位的具有都市性格的作家群。他们成长于一个经济富裕的时代,一个资讯网络盘缠的“都市岛”,都市成了他们最切近的生活空间。摆脱了六七十年代都市批判与乡土怀旧心态,他们是正面迎向“现代都市”这个我们生活所面对的事实的“都市世代”。对于他们而言,“当下”、“现实”就是都市以及“变动不居的社会”。对于都市化进程,新世代作家是骄傲自豪的。“在纷争不断的中国历史,民生的富裕与安定一直是个可望不可及的梦想。但这种梦想在八十年代的自由中国——台湾,已经成了人人习以为常的现实,任何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五千年匮乏的日子,业已一去不复返。”^②美国的支持,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及援助,促进了台湾商业的繁荣,西方生活方式藉着大众媒体、娱乐节目以及“某当奴”(麦当劳)和“啃大鸡”(肯德基)等饮食文化充斥在台湾的大街小巷。从政治到生活层面,日益渗透台湾的民众心理形成了“现代化就是美国化”的观念。然而,“现代化”背后的霸权意识以及以西方经济为后盾的事实形成的受压迫模式带来的文化错位,加深了新世代的认同困惑。他们处身当代台湾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战后城市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同时面临着更深层的文化殖民危机,他们不得不在见证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台湾经济奇迹”的同时,体验文化认同撕裂的疼痛。出生于都会台北却敏感于边缘性弱者地位的本省籍作家黄凡,试图以平等对待所有种族及语言族群却只能在想象中完成对话的林耀德,热衷于在形式实验中质疑与反叛媒体却迷惑于混杂文化形式的张大春,试图在意识形态夹缝中开辟一条新路,悖谬的是却在都市表象下隐藏着分裂的感知。在与异质文化交往中产生的危机感,使得文化认同成了处于相对被动地位的台湾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如东年借《模范市民》的商人廖本和之口的表达:“关于社论和特稿我只关心经济的发展和中美关系,尤其是美国的态度,最后还是要由美国决定台湾的命运。”^③无从决定自己的命运,在第一世界认同体系的阴影里,培养了“美国教育奇迹”下的“华裔神童”,甚至塑造出对华盛顿比对孔老夫子还了解的“美国小孩”,形成了台湾特有的内白外黄的“香蕉人”,黄凡不禁发出“是替中国人增光,还是替美国人增光”^④的疑问。

“都市化”的演变,“西化”的影响,传统文化随

着城市变迁而遭到涂抹、甚至否定;然而自然依附于母国的文化归属感让他们无法释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恋,同化与决裂的两难实现,使他们游走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间。“台湾的殖民及后殖民史比起其他地区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印度、非洲、中南美洲或美国的黑人均无法找到另一个文化原乡可当做抗拒殖民主义的庇护所,而且也无身份的双重性及文化地理的边缘地问题,有其双重乃至多重的暧昧性。”^⑤台湾有着大陆原乡,却无奈在文化地理和历史被视为边陲之地。如张大春《伤逝者》以高索合众国移民安大略返回故乡布龙自治区调查一宗谋杀案的故事,呈现出“历史记忆既是难以捕捉的空虚幻影,也有如鬼魅般无法被一笔勾销的‘第一现场’”^⑥的事实,即使安大略拒绝认同“高索合众国”,也不可能认同“纯种”的布龙自治区文化。安大略的认同难题是高索合众国带给布龙自治区进步神话后引起的,隐喻的正是西方给台湾带来的两难处境。随着都市化发展,晚期资本主义的到来,“现代化”的台湾却难以坚定自身的文化主体性。经历经济繁荣却遭遇国际孤儿的窘境,使得台湾知识分子特别关注文化身份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定位,也使得关于文化认同的思考方兴未艾。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却对其背后隐藏的霸权心存隐忧,在在显示出新世代作家文化认同的撕裂。

三、病症式阅读:后殖民倾向的文化探索

随着解严气氛愈演愈烈,在全球化进程中后现代征象日渐明显的大都会,人们无从逃脱传播媒

① “新世代”是一个因时空转移而产生相对诠释的概念。林耀德选择1949的断代基准,“不仅仅为了这一年是中国分裂悲剧的肇始……,也同时考虑到文化生态和思潮变迁的层面。”这里根据林耀德、黄凡编选《新世代小说大系》时对新世代的定义,指1949年后出生并在八九十年代占据文坛主流位置的作家群。大陆学者朱双一、刘登翰、陈思和、张新颖等的相关评论中对于“新世代”的界定也以《新世代小说大系》为依据或对象。

②④ 黄凡《我批判》,第197页,(台北)联经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6年版。

③ 东年《模范市民》,第134页,(台北)联经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8年版。

⑤ 廖炳惠《台湾:后现代或后殖民》,见陈大为、钟怡雯主编:《20世纪台湾文学专题II:创作类型与主题》,第359页,(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

⑥ 林建光《政治、反政治、后现代:论八零年代台湾科幻小说》,载《中外文学》2008年第9期。

体、跨国公司在台湾经济中发挥的作用,高度商业化的消费气氛犹如精神的“马杀鸡”,“掠夺性的文化帝国主义,透过以美国为主导的传播媒体和跨国公司,如 CNN 和 Microsoft,让全世界的文化越来越屈服于商业考量和跨国信息”^①。人和国家的关系被冲淡,民族认同被削弱,这就是台湾人们生活的现状,也是台湾的文化情境。在台湾的后殖民论述中,无论是邱贵芬对台湾不曾存在“纯”本土文化的“跨文化”特质的解读,还是陈芳明“殖民一再殖民一后殖民”以及独派游胜冠提出台湾仍在国民党霸权统治下的荒谬逻辑,或是廖炳惠关于“后殖民时代一直未曾来临”的认定,因政治立场的殊异,后殖民论述在台湾衍生出相异的解读。但不可否认的是,殖民历史的阴影,后殖民主义的大气候散布在台湾社会中。因此,新世代作家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对自身文化处境深刻焦虑的表达,呈现出后殖民倾向的探索。他们以文化身份确认的困境与集体焦虑的书写,揭示了都市表象后的西方文化霸权带来的迷惘,表现出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自觉。

黄凡在《伤心城》序中曾说“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却不断地在重复着这一呓语:假如中国不分裂。假如中国不分裂,假如中国将茁壮,我们就能像年轻的美国人一样,背着轻松、温暖的历史包袱,跨着勇敢的脚步,大步向前。我们就能创造未来、拥有未来、睥睨未来,我们就是真正的中国。”^②痛心于民族分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造成的历史包袱,在西方都市文化的冲击下加剧了文化身份确认的困境。吕正惠曾言“跟认同小说有些类似,但并没有认同小说那种鲜明立场的,是社会小说。……不过,八〇年代写作这一类型小说最重要的作家当数黄凡。……反而更像一个社会学家,想要探索动荡不安的台湾社会的种种面向。”^③虽然吕正惠把黄凡的创作归入“社会小说”,但仍可以看出对黄凡认同书写的肯定。不同于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和李乔的《寒夜三部曲》以反抗压迫建构认同,黄凡的《伤心城》更多描摹的是台湾都市化社会现实中战后世代的迷惘和挣扎,在西方强势文化建构的现代性模型面前、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身份选择中、个体自由解放与个体文化认同的矛盾冲突中如何确认自身的文化身份。《伤心城》发表于台湾创造经济奇迹的戒严后期,以叙述者叶欣的回忆讲述从贫穷挤进菁英阶层的范锡华。范锡华的成功蜕变历程,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美国。那既是他

理想的园地,又是使他迷惘与挣扎却无从避开的威胁。早在《大时代》里,黄凡就表达了这样的忧虑。无论是对美国办事人员“跑那么一趟,就赚到我半年的薪水”的抱怨,或是对穿着英国裁缝裁制的西装、在外国人和同胞面前用英语交流,脑子里同时共存老庄、孔子和耶稣的留洋博士大谈“传统”、“文化大国”的讽刺^④,对于美国的文化渗透和优越中心地位控制的隐忧已比比皆是。纵然经济继续开放,面对逐渐被编入全球化网络的台湾社会,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眼光看,地图上的台湾岛无疑只是一个边缘之地。对于文化主体的重建,新世代作家依旧茫然。范锡华是学成归来的留美学生,但在他内心深处,仍然无法摆脱边缘弱者的地位,表达出后殖民语境下必然的焦虑“从上海公报开始,美国人的态度已经在明显转变之中,过于依赖美国,将会遭致越南的后果,尽管这是个不快的现实,但是个真实的现实。”^⑤这是主角范锡华带着痛感的清醒。小说中另一个知识分子罗开更加直接表达对这种现实的不平:“我不相信美国人,五四以后,我们拼命移植美国文化,鼓励年轻人去美国留学,为每年的两万移民配额挤破头,好像美国是世界唯一的中心。”^⑥在美国文化和政治制度优于一切的现实下,台湾边陲之地、补给站的地位更加凸显。在这样一个边缘之地的努力似乎难以看到希望“充其量我只是个幻影,只是个泡沫罢了。我的‘奋斗’,正如整个台湾的‘奋斗’,除了证明‘奋斗’这一点外,还有什么?”^⑦奋起遥遥无期、自傲却又自卑的范锡华,坚信帮助台湾同胞重寻尊严的理想,却无奈于民众病态的劣根性。人们只愿守着边缘者的地位,放弃未来,放弃认同,“躲在被子里愉快地啜泣”。相较于范锡华理想的破灭,叙述者叶欣不在理想和信念中恐惧,转而耽溺于金钱和性的官能乐趣,继续美国式的享受,成为“世界性”的公民。无论是范锡华清醒的痛苦还是叶欣自我的迷失,折射的都是“进步”都市表象下伪装着的西方文化主导下的权力宰

① 廖炳惠《吃的后现代》,第3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黄凡《给福尔摩沙——我永远年轻的母亲》,见黄凡《伤心城》,第245页(台北)自立晚报社1983年版。

③ 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第101页,三联书店2010年版。

④ 黄凡《大时代》,第8页,时代文化出版1981年版。

⑤⑥⑦ 黄凡《伤心城》,第97,141,152页。

制,是台湾知识分子徘徊在殖民历史与后殖民语境中主体认同黯然失落的病态体现。

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挤压下,文化碰撞往往牵扯着背后的集体认同的焦虑。叶言都《高卡档案》集体灭族的创痛记忆,黄凡《零》、《大都会的西米》里那个以否定和遗忘为文化症候的机械化社会,平路《台湾奇迹》对台湾领土无限蔓延、扩张的讽刺,表达的都是对历史感钝化甚至“台湾无史”的焦虑,也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恐惧。李昂则以女性记忆构筑台湾的集体焦虑。“在后殖民时代,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台湾需要重建民族历史精神联系,就像曾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需要得到在新时代的自我认同一样。”^①因此邱贵芬说“殖民论述常以性别区分为架构”^②,本土派作家李昂不仅以性别架构写出殖民关系的隐喻,更将背景设在了鹿港小镇上象征传统文化的台湾最大世家的祖传庭园“菡园”。台湾的历史与女人受压抑的历史一样有着千疮百孔的疤痕。李昂在《迷园》中揉入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欲望等等都市社会的题材,还有对在强势权力结构下被支配和被主宰女性命运的关心。朱西彦自认自己是生在甲午战争后的台湾人,是苦着开不了口的台湾人,他把失语的无奈以传统教化的方式遗传给了女儿朱影红,因此朱影红在三年级作文上写下“我生长在甲午战争的末年”,以想象的方式宣告了被殖民的开始。以作外贸累积大额财富的商界大亨林西庚对朱家传奇故事感到好奇,进而亲近朱影红:“你好像生在……生在上个世纪”,“那种传统台湾女人的美德,像贞节、柔顺、有家教、乖巧……”^③这种关于女性(东方)神秘的猜想,无非是男性(西方)话语权威的又一次证明。父辈的阴影无法挥之而去,自觉为发达资本主义的看客提供观赏的文化节目,这“并不全然是萨伊德所说的存在西方书写中的‘东方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反而来自我们的社会”^④,即自我的东方化。朱影红获得巨资修葺菡园而后将其捐赠人民,李昂试图以“菡(汉)园”的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表达台湾人民身处边缘与失语的集体焦虑。

四、跨界交融:历史探寻中主体建构的可能

英文“identity”无论是译作“身份”(如性别、阶级、种族等等)还是“认同”(一种寻找“认同”的行

为)都含有“同一性”的特征。“我是谁”(身份)与“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认同)其实就是以“差异/同一”诠释了“identity”的内涵。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碰撞以及对传统的冲击带来了文化身份的困境,也引发了对文化认同的追寻。斯图亚特·霍尔在《是谁需要身份?》中指出“身份从未统一,且在当代支离破碎;身份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建构在许多不同的且往往是交叉的、相反的论述、实践和地位上的多元组合。它们从属于一个激进的历史化过程,并持续不断地处于改变和转化的进程当中。我们必须使关于身份的辩论处于所有那些历史的特殊的发展和实践当中,这些发展和实践扰乱了许多族群和文化相对‘固定的’特征,这首先涉及一个全球化的过程。”^⑤霍尔摒弃了那种固定不变的、本质主义的认同观,而是以建构主义的认同观寻找变化的同一。生活于“变动不居”的都市,感受着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去中心”和多元化特质日渐明显的后台湾文学时期的台湾新世代作家,避免确定化特征的建构主义自然成为他们追寻文化认同的主要思维方式,是他们在“文化认同感”迷失甚至走火入魔之后,面对进行中的、未完成的认同建构选择的策略。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商业符号充斥的台湾,黄凡、张大春、平路等新世代作家以去中心、反本质的后现代书写反映文化乱象与危机;朱天心则在《古都》里跳脱眷村书写闭室恐惧的焦虑,通过旅行追寻历史记忆的方式打造她的文化主体认同。在本土化思潮高涨的时候,“吃台湾米,喝台湾水四十年而不会说台语”的说法,使得许多人一夕之间成为台湾的边缘人。朱天心作为外省第二代作家同样面对这种认同的尴尬。“文学的认同建构性表明了当今社会和文化与历史上的过去的某种关联。由于认同是动态的、发展的和未完成的,因此,与传

① 方忠《后殖民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见方忠《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第29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

② 邱贵芬《“发现台湾”:建构台湾后殖民论述》,见陈大为、钟怡雯主编《20世纪台湾文学专题II:创作类型与主题》,第316页。

③ 李昂《迷园》,第46页,洪范书店1991年版。

④ 蔡锦昌《东方社会的“东方论”——从名的作用谈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再造》,载《当代》1991年第64期。

⑤ [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第5页,庞璃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统的联系便成为我们思考认同建构的一个核心问题。”^①朱天心针对本土化思潮带来的冲击,从殖民历史的碎片中挖掘台湾人民潜意识里多重身世的迷失,将殖民地国家的前史处在不断地重温和缅怀之中,藉以唤起人们对殖民历史的记忆,以驱除他们身上的殖民伤痕,获得真正的自我。通过重塑过去、回溯历史获得一种对过去的控制,也成了新世代作家文化主体建构的重要策略。“在一个号称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知识讯息急剧流转,空间的位移、记忆的重组、族群的迁徙以及网络世界的游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经验的重要面向。旅行……成为常态。”^②“对于疆界模糊的影响,与跨界所带来的多元位势以及开放与对话的接触空间,新的敏感度和文化形式得以产生。”^③朱天心在《古都》里以旅行的方式表达她融入世界的诉求,出行古都而回望宝岛,回归宝岛却又化身古都人,历史与都会交融、跨界给朱天心带来了对话的可能。在特殊的“出行”和“回归”里,朱天心探寻了台北这座见证了殖民侵占、国府统治以及解严后政党纷争的历史名城,“以极其私密、喃喃耳语式的内心对白反照出一个都市人眼中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生存空间,一个不断引起伤痛、激起想像和回忆的现代大都会”^④。然而凭着一张台北殖民时期观光地图的漫游,当朱天心以一位台湾外来旅游者的身份,自喜于台湾街景舶来产品的随处可见时,却又肯认台北青年控诉、抗议甚至割破指头表达出的爱国热情与精力,时刻想着那座使她迷失、使她伤心、但支配了她生命的城市,她无法无视隐藏在富裕背后西方文化工业对台湾的经济控制与掠夺。经历变动、碰撞与交流,殖民双方是否依然对立?身在北京,却感受到唐朝文化的底蕴;置身台湾,异域色彩的生活犹如置身异域之感。朱天心在悠悠的都市怀旧叙事里,构筑了她心中的“我城”:文化认同的多样性。而这不会影响台湾带给她的家园感,不会影响她爱台湾这片土地就如空气如家人。“文化认同……关键不是我们认同什么,而是我们如何建构一种开放、包容、批判的认同空间。”^⑤时间和空间的双重交叠隐含的是作者对认同的追问。旅行中的跨界与交融,是包容着“世界的声音”的更开放姿态。霍尔指出“认同的未完成性和过程性,揭橥了认同具有开放性和可塑性的特征。”^⑥朱天心跨越时间与空间,在使都市文

明再现一个新高度的同时,构造了充满流动性、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跨界景象。多重的叙事网络,强化了历史脉络的复杂性,反映的是台湾民众的心理,也是台湾人的宿命,在流动中不断尝试文化主体的建构,继续着一个未完成的过程。

在台湾,“战后国民党依靠美国经济援助,实行土改,走上‘美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与此相伴,美式西方现代观念开始流行”^⑦。因此,西方文化在台湾都市的渗透随处可见。张大春在谈“城市靠谁来记忆”时提到他保持着一个习惯:只要有机会在街上行走,都会注意市招。他发现随着时间流逝,台湾街头颜体字招牌逐渐被日欧式的中文字体所替代。这种混杂的文字,牵叠出不同的文化脉络,却以一种坚定的流行姿态让人无从回避。台湾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逐渐被打破,文化交融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态势,成就文化认同的第三种可能——多元与杂糅。但是,所谓的“现代化”,所谓的“融合”,在缺乏主体认同和自身“文化自觉”的情况下,不应该是一种不必反思的价值取向。新世代是否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独特的节奏和韵律,这或许也是笼罩在多元文化迷雾中的认同问题继续成为新世代思考方向的动力。

【责任编辑:赵小华】

- ① 周宪《文学与认同》,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 ②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 ③ 廖炳惠《关键词200》,第25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 ④ 唐小兵《〈古都〉·废墟·桃花源外》,见朱天心《古都》,第249页,印刻文学出版2009年版。
- ⑤ 包兆会整理《“中国文学与文化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 ⑥ [英]斯图亚特·霍尔等《表征》,第10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 ⑦ 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第1页。

ABSTRACT

Methodolog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y YANG Yi)

Abstrac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e light of ancient and modern views , as well as Chinese and Western ideas. Lu Xun's prose Baicao Garden to Sanwei Study tended to be misunderstood by misleading theories. His article about his father's illness should also be understood by the use of the root method , back in Lu Xun's origi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should recognize the experience of finitude , starting from a real life attitude to select the existing theory for our studies.

Key words:

On the Use of Literary Resources in Macau Culture

(by ZHU Shou-tong)

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open literary resources to set up Macau culture. General speaking , Macau has no high-level literary creation , but its resources of literature are not so poor. The two famous writers from ancient China and the west , namely Tang Xianzu and Luis de Camoes , had close relation with Macau , and the modern famous novelist Yu Dafu also had close contact with it. Even though we have no evidences to confirm that they did come to Macau in their own times , we can analyze their works to get our inferences about it. Such an analyze and inference can also be renewable resources to Macau culture.

Key words: Macau culture; literary resources; Tang Xianzu; Yu Dafu; Luis de Camoes.

Macau: Literature and Context in Business

(by WANG Lie-yao , WEN Ming-ming)

Abstract: The newspaper supplement of Macao is not only a carrier and medium for literature , but also a context of Macao literature. Its special media culture or supplement culture has penetrated into all aspects of Macao literature activity , intrinsic to shape the spirit of Macao literature and art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mmercial context , Macao literature is inevitably subject to materialization and alienation. Commercial consumption was involved in Macao literature. Elite consciousness gave way to commercial awareness and consumption awareness. The readers' focus on literature changed from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to the physical dimension. The widespread loss of literature has become an irreversible situation in this process.

Key words: Macao; commercial context; literature; context; Macau Daily.

Cultural Identity in Macau Tour Poetry from Ming and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by WU Min)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acau tour poetry of Chinese literati from 16th century to 1949. The paper summarizes thre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Macau tour poetry from content , emotion and form. These include unique innate tourist element , mild restrained national character and a consistent classical nature. These authors were mostly people running from war , bureaucrats in official travel , foreign church believers and Chinese literati in short-term stay for various reasons. They described special ways of the world , sceneries ,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beliefs in Macao when they wrote down differences , tourism feelings and lyrics. These works added a touch of exotic scenery a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astoral poetry. In addition , the continu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legacy ,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elatively peaceful social atmosphere in Macao determines the national feelings showed in these poems. It forms a calm , restrained emotion qualities.

Key words: Macau; tour poetry;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Tête-Bêche Narrative: Postmodern Film and Literature in HongKong

(by LING Yu)

Abstract: Tête-Bêche narrative is one of the cross-border connections between novels and movies. Wong Kar-wai's movies were good at creating the invert of time , space , sound and picture to express difficult implicit psychological ideas. He was inspired by inverted ideology and narrative creativity in Liu Yichang's novels , and also enlightened by the inverted narrative originality in the European soul movies including life and death , and the tri-color. There exist the multiple echoes among the modern and postmodern fictions and films in Hong Kong and the European New Wave film. We can understand the form as the Tête-Bêche narrative theory in Hong Kong.

Key words: Tête-Bêche narrative; Hong Kong; film and literature; new wave films.

Exploring through Urban Appearance——Cultural Identity Writing of Taiwanese Novels in the New Generation

(by LIU Wei-yun)

Abstract: Since 1980s urban novels sprang up in Taiwan's literature. The new generation became the main writers , concealing the absurdity of divisional cultural identity , presenting their postcolonial exploration about the cultural identity dilemma and the collective anxiety after the urban appearance. Simultaneously , the new generation expresses their demands and possibility of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crossover and integration in exploring their historical memory.

Key words: the new generation; urban novels; postcolonial; cultural identity.